

※「二十一世紀的漢學對話」專輯※

## 二十一世紀的漢學對話 導 言

王瓊玲\*

在國際學界，有關「漢學」一詞的定義，歷來較難統一。德國漢學家福蘭克 (Otto Franke)，曾將「漢學」詮釋為是一門研究中國人與中國文化的學科。此一定義由於涵蓋面較廣，故從之者眾。此外，另一流行於西方學界比較約定俗成的說法，則是將它定位為是一門關於中國、中國文化與「中國性」(Chineseness) 的學問<sup>1</sup>。事實上，Sinology 這一概念，是十九世紀才正式出現於英語文獻的。我們可以概括地說，「傳統漢學」若以耶穌會士利馬竇來華時期作為起點，至今已有四百多年的歷史。且在積累了許多學者的共同努力後，漢學已發展成為一門涉獵廣泛，尤其在文化研究上富有成就的跨學科門類。至於頗受注意的美國漢學，在它結合了二戰以來全球戰略視野之後，亦已不再是以特定領域的學院式方法為主，偏向語言、歷史、思想文化方面的研究，而是進一步將之拓展成為全面的「中國研究」(China Studies)。其特點是社會科學方法的全面引進，與研究對象領域的全方位拓展，成為對應全球政治的「世界研究」之一部。在美國等國家，這種廣泛的學術興趣，已經發展成為包含了當代對於中國政治、外交、經濟、金融、管理、法律、軍事、社會、哲學、歷史、文學、影視傳媒、藝術等學術領域的中國研究。這使得所謂「漢學」這門學問，以它今天所具有的視野來說，對於增進中國與西方的瞭解、交流與溝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當前西方關於中國問題研究的這種新趨勢，是與全球化 (globalization) 的總體趨勢相應的，而這也是對應於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各方面迅速發展

---

\* 王瓊玲，本所研究員。

<sup>1</sup> 參見楊煦生：〈漢學：回溯與前瞻〉，《瞭望》，2007年第13期（3月26日），頁35。

應有的結果。在「漢學」的名義下，海外學界與中國社會所存在的自我反省，發展出一種對話方式的關連作用。在這種對話關係中，其實一直折射著西方或東方文化自我理解的一個曲折歷程。當海外漢學在世界範圍內建構中國圖像，並以此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世界對中國的文化觀念乃至國家政策的理解時，對於中國社會而言，它已不僅是中國學術場域中的一種論題反響而已。在全球化的時代中，中國學術界新一輪的自我理解，是重新通過他者（無論是東方或西方的鄰國）所建構的中國圖像來進行的<sup>2</sup>。國際漢學的研究，隨著中國學術界的主動介入，有望進入一種互動的、平等的、文化對話式的新模式。此種模式，對於漢學研究的未來發展來說，具有重要的指標意義。

也就是基於對此種「漢學對話」的期待，在一偶然的機會裏，經由王德威院士的推薦，我們閱讀了陳平原教授的大作〈視野・心態・精神——如何與漢學家對話〉。文中陳教授首先提醒讀者所謂「漢學家」並不等於「國際學界」，相反地，所有的「漢學家」，都有與其本國學術界對話的欲望與責任。陳教授並提出與漢學家對話應具備的三項要件，即：更開闊的學術視野、保持和平的心態，並在學術交流中應儘可能地從資料、技術層面，逐漸擴大到理論、精神層面。他並強調，中國學界與漢學界雖在「如何詮釋中國」這個問題上，確實存在若干話語權之爭，但只說「和諧」尚不足，還需要「同情之瞭解」，以及「不卑不亢」的辯難。所謂的「對話」，並非走向「世界大同」或「輿論一律」，而是儘可能地完善自家立場。此文不僅思路靈活，且視野開闊，不僅對於中國學界應如何與漢學家展開對話有深刻的見解，其本身即是我們建構漢學對話平臺的絕佳引言者。我們於是進一步邀請了遠在美國耶魯大學的孫康宜教授、日本京都大學的平田昌司教授、香港科技大學的陳國球教授，與臺灣中央大學的康來新教授等知名學者，希望能在本所《通訊》的園地中，建構一座動力十足的國際學術交流平臺。

孫康宜教授〈談談美國漢學的新方向〉一文，係以耶魯大學為例，說明該校漢學研究之歸屬特點。因為有別於美國的其他大學將「漢學」研究及教學集中統合於所謂「區域研究」(area study)之內，耶魯則是按「學科研究」(disciplines)的分科性質，將所謂「漢學」的實質觸角，延伸於各個領域之內。這種以「學科」為主而不以「區域研究」為主的傾向，顯然與這二十多年來的全球化趨勢不謀而合。孫教授

<sup>2</sup> 同前註。

指出，從前歐美的傳統「漢學」，是將中華文化當成博物館收藏品來鑽研的。在那樣的研究傳統與環境中，凡是用中文寫成的文本，都成了解讀文化「他者」的主要管道。但是一九八〇年代以後，美國漢學中的中國文學研究，逐漸成了「比較文學」的一部分，有些漢學家既屬於東亞系，也成了比較文學系的成員。而自一九九〇年以來的全球化趨勢，已使我們進入一個多元時代，因此，孫教授強調，中西固然還有區別，但同時也出現了新的融合，對於「西方漢學家」，國人只需以平常心對待，不必特別抬高他們的身價，也不應出於自衛心理而妄加輕視。

至於平田昌司教授則以〈從海外漢學看軸心漢學〉一文作為回應。他以中國大陸、臺灣、香港等漢學研究核心區域之漢學，稱為「軸心漢學」，認為軸心漢學與海外漢學（主要是北美漢學），似乎隱約存在正閏意識上的對抗關係。平田教授指出「海外漢學」其實頗為多元，學術態度亦多有差異，且存在兩個極端。一種類型的西方漢學家，往往以歐洲人文修養與訓練為背景；而另一類型，則是儘量模仿軸心漢學的思路與研究模式，致力於「比中國人還要中國」。至於近代的日本漢學，由於十九世紀中期以後，漢學已經徹底失去了位居日本主流話語與日本主流學術地位中的核心位置，在經過吸收西學／西方漢學的思路與方法、中國化／日本國粹化、菁英化／大眾化、世俗化／非政治化等抉擇之後，日本漢學已經徹底調整，從而呈現一種多元樣貌。而這也反映了近代中國及軸心漢學內部的所謂「多層次性」。

陳平原教授在前述文中，曾提及二〇〇六年正逢捷克漢學家普實克 (Jaroslav Průšek) 誕辰一百週年，中國國內外共舉辦了三次紀念活動。當時中外學者聚集一堂，追念普實克的學術貢獻，以及與中國人民的深厚友誼。有鑑於此，陳國球教授即以普實克為例，論述中國學界在面對世界漢學家時應有的態度。他在〈如何瞭解「漢學家」——以普實克為例〉一文中指出，普實克對於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有兩個最重要的特點：一是他的結構主義的思維方式，表現在他對文學運動以至文學作品的系統式結構理解；另一則是他對於現代文學中精神意蘊的體會。「抒情精神」(lyricism) 是現代中國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概念，而普實克可說是這個概念的重要推動者之一。陳教授點出，普實克此番創獲之來由，有一重要因素，即是普氏思維中的文化脈絡；而且若把視野進一步擴寬，更可以將此種對中國抒情傳統的傾慕意識，溯源至十八世紀末捷克民族復興運動以來的波西米亞浪漫精神。也就是說，是「浪漫主義」、「捷克詩性主義」、西方文藝種種「前衛運動」與中國文學

精神匯聚於普實克身上，現代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路向才應運而生。因此，陳教授強調，我們若要充分領受「海外漢學家」的創獲，也需要有開闊的胸襟，才能探索其「學問的根源」，進而體察其「文心」。

最後，康來新教授〈在競合關係中的漢學對話——以臺灣高教系統為例的實踐舉要〉一文，是以其多年在中央大學執教與研究的豐富經驗，提出臺灣的「校園漢學」是如何經由推展從而擴大其影響力的。她舉出了三項有開創性與啟發性的例子：輔仁大學《華裔學志》漢學研究中心的啟動、「國際青年學者漢學會議」系列的舉辦，以及中央大學接軌國際漢學之方案。此三種漢學教研活動透過期刊、書籍出版，以及國際會議之籌辦等多元機制與作法，有效地展示了臺灣「校園漢學」在推展漢學研究方面的努力，也成為未來臺灣漢學研究史的重要側面。

非常感謝五位教授賜稿，成就了這次「二十一世紀的漢學對話」專欄。本所自一九八九年成立以來，即積極展開與國際漢學界的溝通對話，同時與國內相關學者及學術機構建立合作關係，並善用院方所提供的資源人力，發掘優秀人才，提供彼此學習的平臺。一方面引入新觀點、新方法，一方面也希望將臺灣學界卓越的研究成果，介紹給全世界。我們除了有系統、有計畫地譯介海外的研究成果，並召開各種國際會議，提供國內外優秀學者溝通對話的場域外，近年來，本所亦積極地與海外重要研究機構簽訂合作協定，其中包括東京大學人文學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以及若干尚在洽談之中的單位。此外本所亦致力於豐富圖書館館藏，已提供海內外學者研究之便利。整體而言，以文學、哲學與經典研究為重點，企圖構築本所成為一足以匯集海內外漢學研究成果之學術交流平臺，已成為本所努力之明確目標。此次「二十一世紀的漢學對話」專欄，即是本所推動漢學研究全球化對話的一項重要活動，而其成果，亦將成為此項努力之珍貴紀錄。